

西安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 大革命时期陕籍青年在上海大学……………党伯孤 (1)
- 回忆渭北游击队的斗争 (1926——1949) ……孙志正 (9)
- 追念许权中同志……………苏济吾 (40)
- 我所知道的任耕三烈士……………刘威诚 (45)
- 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晋震梵 (54)
- 国民党统治时期陕西兵役苛政见闻……………宋旭初 (66)
- 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冯美铨 (74)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派系斗争……………马建中 (88)
- 忆“长安民众剧团”……………阎志霄 刘光黎 (102)
- 《西京平报》最后的四年……………樊玉淦 (118)
- 西安教育史的重要篇章——纪私立成德中学
——中山中学——省立二中 (上) ……田克恭 (123)
- 西安集成三酸厂……………窦荫三 (143)
- 西安的城隍庙市场……………王明杰 蒲生高 (151)

简话青、红两帮 郭叔蕃 (160)

“草堂寺” 康寄逵遗稿 (169)

西安西大街 田克恭 (179)

大革命时期陕籍青年在 上海大学

党伯弧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当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工人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壮烈斗争史实，为革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上海大学的革命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参加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现就本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上海大学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由“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改组而成。校址从闸北迁至原公共租界西摩路，租赁房屋，进行教学。校长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名义上是经过校内、外的国民党人所公推，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在学校改组过程中，党中央曾从各方面给予了协助和支持。于右任家住上海，以擅长书法负有盛名；特别是早年在上海创办过《民立报》，以敢仗义执言深得社会人士的称誉。于右任在陕西靖国军战役之后，辗转绕道四川来到上海，从事教育事业。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

标下，是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

以后由于于右任长期远居广东，学校日常工作，则由副校长邵力子主持。上海大学设有三个系，即：社会学系（注：原名如此，并非社会科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社会学系主任，先后由瞿秋白、施存统（复亮）担任；教授先后有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任弼时、蒋光赤、李季、彭述之、郑超麟、尹宽、刘人镜、王一飞、高语罕、杨贤江等。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教授有茅盾、田汉、刘大白、郑振铎、谢六逸、朱湘、方光焘等。英国文学系主任，先后由何世桢、周越然担任。何世桢后因企图夺取学校的权力，煽动英国文学系部分学生闹事未能得逞，遂拉走一些学生另创“私立持志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和教学工作，由周越然、周由廛昆仲和其他知名人士长期担任。上海大学三个系，连同附属中学，共约学生千余人。参加爱国民主活动的，主要是社会学系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合法的爱国斗争和宣传，组织群众配合工人运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这一系的学生，接受马列主义较早，思想觉悟进步较快，有很多学生毕业一、二年后，便投身于革命行列，成为党的秘密组织的骨干。有的前往广州投军，有的远赴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或“东方大学”学习。现就记忆所及，陕西学生先后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有：吉国桢、张仲实（安人）、严信民、李子健、邹均、马文彦、何尚志、关中哲、马凌山、武思茂、王超伯、段实斋、艾稚青、张字六、刘济生、何挺颖、谢作民、廖左民、李德馨（咏五）、王向离、李树烈、党维蓉、孟芳洲、冯润璋、张庚由、王秀清、高岱、党伯孤、秦治安、李叔溪、蒲克敏、曹趾麟、刘文

蔚、高伯定、柳长青、张云青、李芳（洁民）、白民善、柳必正、许尚志、王友直、王正谊、张季华、孙玉如、李景泰、刘皋天、王恒萃、焦廉甫、常光祖、武继祖、雷百里、王怀德等。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在闸北青云路，上海大学的陕西同学为了促进团结、共同进步，还组织成立了上大陕西同学会，并出版《新群》半月刊，旨在宣传和灌输马列主义，对当时政治形势发表一些评论，发行范围是在上海各校的陕西学生、群众团体、报社；在北京的陕西学生以及陕西的一些中等学校。它对陕西青年学生的进步，有一定的影响。

上海大学的革命同学，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进行英勇斗争，并不局限于上海一隅。在沿海工业发达的地区，在内陆一些较大的城市，也有党中央派往做工作的上海大学同学。如党维蓉在青岛，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组织遭到破坏，党维蓉同志壮烈牺牲；孟芳洲在陕西参加游击队而牺牲；何挺颖在江西反围剿战争中被俘不屈而死。

中共上海大学的基层组织是党支部。支部以下按党员人数分编成若干小组，组设组长。支部与组是单线联系，各组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一九二六年革命进入高潮，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搬到天通庵车站附近的施高塔路租界区内办公，距上海大学青云路校址近在咫尺，罗亦农同志经常来校，布置工作。当时上大党支部书记是杨振铎（山西人），副书记是党伯弧，是由上海市委指派的，后来杨振铎同志因工作调走，支部召开学校全体党员大会，由市委提名党伯弧接任书记职务。市委书记罗亦农同志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时期的上大支部一次党员大会。上大附中则有团的组织。上海大学虽然是一个革命的

大学，但三个系的学生，各有不同倾向：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较少，他们多数的志愿是学好外国语，将来进洋行多拿一些工资，生活过得舒适些。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多数人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将来成名成家。当时，尽管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等等各种政治派别都有，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学系的绝大多数同学，都积极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党在学校的威信是很高的。上大同学在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分化、改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尖锐的较量。记得当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北京召开所谓“西山会议”后，上海大学学生会于一九二六年进行改选时，在上大的“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就企图趁机夺取领导权，把上大的学生会拉向反动的道路。上大党支部为了挫败“西山会议派”这一阴谋，便把原任学生会主席的郭伯和临时从秘密工作中调回，主持大会，经过周密部署，在“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进行捣乱时，便把他们赶出会场，胜利地完成了改选工作。

一九二五年在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由日本帝国主义经营的内外棉十四个工厂的一些工会组织，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日商进行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人组织——工会，遭到镇压，同兴七工工人顾正红同志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无比义愤。上海大学学生朱义权等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为顾正红同志举行追悼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进行了控诉。租界当局派警、探将群众驱走，捣毁了会场，并将朱义权等同志拘捕关押。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租界当局于五月三十日释放了朱义权，上海大学同学整队欢迎英雄出狱，并向南京大马路挺进，游行示威，与各方面革命群

众和市民群众汇合，声势极为浩大。在老闸巡捕房前，英国巡捕把大批游行群众关进捕房，革命群众奋力冲击，要求立即释放，帝国主义分子怕得要命，凶相毕露，开枪进行血腥镇压，上海大学同学何秉彝殉难牺牲，死于南京路闹市区老闸捕房前的血泊中，这是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的一个侧面。何秉彝同学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的带路人，他的死，使我感到非常悲痛！

“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激于爱国义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南京路商店门户扃闭阒无一人，平时繁华的闹市变成了一条死街。由于上海大学同学四出奔走，广泛宣传爱国反帝，租界当局视为眼中钉，六月四日上午竟派英国巡捕与武装英国士兵包围学校，同学们被驱赶离校，学校竟被强占，成为兵营。在反动淫威的压迫下，上大革命师生不畏强暴，学校迅即在中国地界“西门”租房办公，联系离散同学，筹备复校工作。暑假后，在闸北青云路租到的楼房修缮竣工，同学们迁入新址，便陆续复课了，革命斗争和学习活动又轰轰烈烈地继续进行着，这是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有力回击。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妥协投降，南京路商店开门复业；工人群众则坚持奋战，继续罢工，进行斗争。革命阵线分化了，革命转入了低潮。同年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群众的反帝斗争，上海大学革命同学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动员下，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区，向工人散发传单、讲演宣传，积极声援工人的斗争，在日探巡捕暴力袭击下，孙金镗夫妇、蒲克敏、曹趾麟、党伯孤等十二人被捕，拘押在普陀路巡捕房，翌日（星期一）用囚车把这些人

押解到“会审公廨”进行审讯。经上海市学联和中国济难会委托江一平律师出庭辩护，得以交保获释。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当即把保释出狱的同学们用汽车迎接到闸北的秘密会址，举行茶话会，热烈欢迎同学们脱险胜利归来。这进一步激励了斗争意志，同学们决心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日商内外棉纱厂区工人群众坚持罢工的斗争，是在工人群众领袖刘华同志（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刘华同志是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在接受马列主义洗礼后，投身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敌探密布、工贼如毛的险恶环境中，日夜操劳，致成沉疴，在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后，当他独行经过静安寺马路时，为日探跟踪识破，致遭拘捕关押。孙传芳率领五省联军进驻上海时，日本领事特举行欢迎宴会，为了相互勾结，竟将刘华同志由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反动军阀，于六月十七日秘密杀害。刘华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人群众悲愤至极，印制大号的刘华同志遗像和他英勇斗争的事迹，在静安寺路、南京大马路至外滩一带，举行飞行示威，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强大威力和不屈不挠的反帝英雄气概。

当北伐军挥师北上，进军华中，汀泗桥一战击溃了吴佩孚纠集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后，孙传芳率部移驻江西，按兵不动，企图负隅抵抗。新军阀蒋介石，因个人在北伐出师以来，军事上未能有所建树，没有取得战绩，遂强自指挥江西战役，连连受挫，后在国民党左派部队增援下，才打垮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沪宁线上的防守部队，抽调一空，另由奉军杨宇霆接防南京，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在这一有利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积极策划军运工作，组织工人武装力量，准备武装暴动，迎接北伐胜利。在先后三次武装暴动中，上海大学革命同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各项工作。在二次暴动前夕，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来到闸北青云路某里弄党的秘密机关，亲自向参加武装斗争的同志，点发枪支，鼓舞士气，群情非常激动。二次暴动发难前，上大革命同学在党支部动员命令下，在虬江路一带进行宣传鼓动，得到了市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雇佣的大批流氓打手，预先暗藏在商店里，傍晚时蜂拥而出，大打出手，致使手无寸铁的同学多人受伤。因为众寡不敌，同学们相继退出战斗，二次暴动的准备工作，因而受阻。

在第三次暴动的准备工作中，为了探明毕庶澄部队的内部情况，上海大学党支部选派了部分北方籍的同学，打进了毕庶澄部组成的政治宣传队和其他军事组织，对准备工作起了有利作用。有的同学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在进出租界与华界毗连的检查站时，巡捕与外国水兵，检查很严密，就是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地下交通人员，胆大心细，还是把从租界里党的地下工厂印刷的宣传品，装在雇用的卧车里，闯过了租界的检查站，及时地把宣传品散发给群众。在第三次暴动的组织和指挥者之中，郭伯和同志是长期离校从事工人运动的上海大学学生会主席，以及何大海同学都是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声誉和威信，在三次暴动中，他们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在江湾新建的校舍落成，学校从闸北青云路搬往江湾。那时候，白色恐怖严重，工人、学生不断遭到逮捕和杀害，人们称当时的上海是“狼虎（筹备司令杨虎）成群（市长张群）。”党的地下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联络极度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大学革命同学，还是潜入市区，进行秘密活动。由于上海大学革命色彩浓厚，不久，便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查封，上海大学就此夭折！但是，上海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持指引下培育出来的革命火种，则撒向祖国各地，迸发出炽烈的火花。上海大学的光荣历史，永远是不会泯灭的！

回忆渭北游击队的斗争

(1926—1949)

孙志正

前 言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一九八二年六月将原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属的三原县武字、心字地区划为革命老区。省委的这一决定清除了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恶毒诬蔑，恢复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荣誉，使根据地的人民从林彪、江青一伙的枷锁下得到解放，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衷心拥护省委的这一决定。

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渭北高原的三原、富平、耀县、淳化和泾阳五县的交界处，其区域范围：东临富平县境的石川河，西至泾阳、三原、淳化三县所属的嵯峨山，南达三原白麓原、天齐原、七里原畔，北起耀县小丘镇、华里坊，东西宽约五十里，南北长约六十里，面积约三千平方里，人口四万多。赵氏河、浊峪河、清峪河纵贯南北，西有嵯峨山，北邻北山，形成沟原相间、川山相连的地形，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南沿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十余里，距陕西省会西安市约一百里，好象一把尖刀直刺

敌人的咽喉，使国民党反动派颇感威胁。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就对这个地区开始了频繁的残酷的“围剿”。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这个地区乃是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使是正常年景，人民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十分贫困。如遇荒年，群众只得卖儿卖妻，或背井离乡、沿门乞讨，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悲惨处境。同时，这个地区的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过同盟会、陕西靖国军反帝制、反北洋军阀的革命影响，人民要求革命的心情，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烈火就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是由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乔国桢（注）于一九二六年创造的。

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二十多年中，该地的党组织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组织人民武装，坚持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成立苏维埃政府，创造了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时期建立了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解散反动民团、组织农民赤卫队。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抗粮、抗款、“交农”，打土豪、杀恶差，赈灾，分地主粮食，消灭地主武装，摧毁国民党政权，组织农民协会、反日会、农民联合会、赤卫队、渭

注：乔国桢一九〇五年生于陕西省佳县，一九二四年在陕西绥德师范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曾任中共陕甘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北方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一九四五年七月牺牲于敌监狱。

北灾民自救军、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关中十九路军，建立渭北苏维埃政府，在渭北高原举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日，积极培养干部，准备组织武装保卫陕西。解放战争时期组成渭北总队第一支队、第四支队，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争，在三原、泾阳、富平、耀县、铜川、旬邑、彬县一带与蒋胡匪军进行长期战斗，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解放三原县城。

国民党反动派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恨之入骨，诬蔑根据地是“匪区”，根据地的党组织是“共匪”，根据地的人民是“土匪”，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残酷的“围剿”。国民党军所至，杀人放火，庐舍为墟，先后有千余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有数百名惨遭杀害，许多同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到处一片白色恐怖。

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诬蔑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是“狐群狗党”，诬蔑赤卫队、渭北灾民自救军、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关中十九路军和渭北总队的指战员是“土匪”，把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打成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大黑帮”等等。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至于被斗被打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幸免。并且株连亲属子女，不准当兵，不准上学，不准当工人，不能入党入团等等。在迫害革命同志的同时，对革命烈士也不放过，收了烈士证、烈士牌，平了烈士的坟。在这期间，有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也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疯狂地配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诬陷迫害革命同志，把肖德印、侯长令、孙志正等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唐玉怀同志被特务活动分子景树新诬陷迫害致死。

为了使人民群众了解渭北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情况，发扬革命传统，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根据有关渭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文献和一部分同志的回忆材料写成此文。由于资料不足和作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一、大革命时期

(一) 建立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1926—1927）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陕西的渭南、华县、西安、三原、榆林、绥德、安定、延安和富平等地就开始有了党的活动。

三原县是渭北各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我党早期在陕西的活动基地之一。一九二四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恽代英派李秉乾（李子健）回陕西发展组织；李在三原师范任教，联络各校的进步青年，建立了“渭北青年社”，创办《渭北青年》，吸收各校先进分子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季，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原特支，受团中央直接领导。1925年下半年，团中央的特派员吴化之来三原和李秉乾协商，决定挑选十来个优秀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了中共三原特支，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党团组织一建立，立即开展了学生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举行“非基运动周”。

一九二五年七月，魏野畴等在三原召开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大会决议，发动全省学生支援西安一中学生的斗争，开展驱逐北洋军阀吴新田的运动。暑假，魏野畴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暑期讲习会，参加学习的有党团员、渭北青年社社员和进步学生共一百多人。魏野畴、赵宝华、关中哲等在讲习会讲授革命理论，培养革命干部。

一九二六年冬季，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长史可轩举办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参加讲习所学习的有六十多人，武字区参加学习的有李多章、王举英、张玉祥、韩鼎周、宋纪文、屈绳榜等。在讲习所担任讲课的有史可轩、魏野畴、庞诚斋、乔国桢、田望治等。1927年三月初学习结业，学员分赴各地，参加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乔国桢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中学介绍唐玉怀（注）入党，同年九月，唐玉怀陪同乔国桢到三原武字区创建党组织，搞农民运动，展开宣传组织工作，进而武装群众。十一月在武字区大寨堡召开千人群众大会，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协会。五个分区均有分会，三十八村均有村委会。农民协会代替旧政府行使政权机关的职权。农民协会得到史可轩大力支持，中共三原县委派孙一君、马步益参加大会表示祝贺。大会选举乔国桢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张振海、郭明校、薛廷俊、侯永益、肖德印等九人为委员。乔国桢在大会上讲话说：

注：唐玉怀，又名唐亦民，三原县武字区唐家堡人，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武字区农民协会副主席、中共武字区委副书记、武字区反日会副主任委员、三原县陂西区区区长等职，一九六九年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进行斗争”，大会当场撤销了王厚安的武字区反动民团团总职务，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赤卫队。审理了义和村地主崔福成霸占贫农胡老本土地和西王堡地主锥彦福敲诈贫农王大娃的案件，有力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气焰。农民协会成立后，接着为人民办了几件事：第一、撤销地亩附加税（田赋陋规“麦米存”）和防兵之类的苛捐杂税，将旧日每元纳田赋正银四钱二分改为纳田赋正银三钱八分，减轻了人民负担。第二、禁止赌博，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第三、审理民间案件，打击豪绅，保护人民利益。同时武字区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二七年春季，武字区郭明校和富平县淡村区（称字团）秦悦文、郭效曾、全应贡等组织淡村区农民协会，宣传禁烟，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六月十九日、冯玉祥、蒋介石徐州会议后，冯、蒋合流反共。冯玉祥成立了反动的陕西省政府，在陕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陕西。共产党员被杀害，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被捣毁。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国民党驻三原的田玉杰部参谋长路禾甫、政治处长程鼎臣，在司令部召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张耀斗、农会主任庞诚斋和一些中学教员开会，路禾甫在会上说，奉冯（玉祥）总司令电，实行清党，停止农会活动。由于庞诚斋反对农会停止活动，触怒了路禾甫和程鼎臣，会后庞诚斋、张耀斗被拘留。这时原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安乘机活动，伙同西王堡地主土豪锥彦福及沟南堡地主苟世英，于七月四日勾引驻三原的国民党田